

从若翰到耀汉

——中国本土男修会耀汉小兄弟会的成立及其修
会精神（1928—1934）

From Ruohan to Yaohan: the Founding and Spiritual
Practice of Little Brothers of St. John the Baptist,
an Indigenized Catholic Congregation in China
(1928-1934)

刘 贤

LIU Xian

作者简介

刘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LIU Xi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Qing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liuxian@ruc.edu.cn

Abstract

The Little Brothers of St. John the Baptist, together with the Congregation of the Disciples of the Lord, were among the earliest indigenized Congregations in Chinese Catholic history. Little Brothers of St. John the Baptist was founded in 1928 by the Belgian priest Vincent Lebbe (who was later given Chinese citizenship), and adapted the austere regimen of the Order of St. Benedict, adopting “Sacrifice Fully, Love Sincerely, Rejoice Constantly” as their motto. Based on newspaper articles and memoirs, this paper tries to trace this congregation’s founding history, its unique abbey culture, and the formation of its spiritual tradition. Through the naming of the abbey (“Zhenfu Yuan” 真福院), its unique religious culture, missionary practices, and ritual and music reforms, the efforts that the Little Brothers undertook to indigenize the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can be seen.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self-sacrifice of the Little Brothers of St. John the Baptist reinforced its identity as an indigenous Chinese Catholic congregation.

Keywords: Vincent Lebbe, Little Brothers of St. John the Baptist, Total Sacrifice, True Love of Others, Constant Joy, Indegenious Congregation

在近代中国，耶稣会、多明我会、圣母圣心会、遣使会、圣言会这些著名的修会在中国或传播西学，或深入乡间，或远至边疆，或经营图书，或办理大学，各自在中国基督教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然而，这些皆是来华的欧美修会。以中国人为主体的本土修会甚少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其实中国本土修会早已存在，且为数不少。之所以寂寂无闻，大概是因为其中多数是隶属于教区的修女会，她们的事迹和影响多局限在本教区。在寥寥可数的本土男修会中，以耀汉小兄弟会和主徒会成就最大，虽然成立时间较晚，但其传教事业和精神影响都跨越单一教区，并且体现了中国天主教本地化的前进进程。本文即是对耀汉小兄弟会的早期历史^①及其会院精神的初步探究。

一、缘起与产生

自使徒时代，就已有师表耶稣的贫苦和牺牲精神，自动放弃财富，度穷人生活的修会精神。自三世纪以后的几百年间，独修、隐修、设立会院者不乏其人。^②其中，圣本笃（Saint Benedict of Nursia, 480-547）是西方隐修传统的鼻祖^③，本笃会的会规也被后世的很多修会奉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清代宗教与国家关系研究”（17JJD770013）阶段性成果。[This paper is supported by the Major Project “Relations of Religions and State in Qing Dynasty” of Key Research Bases for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Project No.: 17JJD770013).]

^① 关于耀汉小兄弟会的研究，目前所见只有一篇，但较为偏重1934年之后的历史。李启煌：《耀汉会在华宣教研究1935-1941》，台湾东华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LI Qihuang, “The Evangelizing of Little Brothers of St. John the Baptist in China, 1935-1941” (MA thesis, Dong Hwa University, 2015).]目前关于雷鸣远的研究为数不少，但是关于雷鸣远创立修会的过程、他与修会的关系，以及耀汉小兄弟会的会规、精神等，还没有专门的研究。

^② 顾安基：《天主教修会重整史》，孙纯彦译，台南：天主教闻道出版社，2007年，第i页。[Fr. Angel M. Cuesta, O. A. R., *History of Rearranging Catholic Congregations*, trans. Fr. Benito Suen, O. A. R. (Tainan: Catholic Window Press, 2007), i.]

^③ 刘国鹏：《天主教修会之组织及源流》，《基督宗教研究》（第十九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第201页。[LIU Guopeng, “Organization and Origins of Catholic Religious Orders,” in *Jidu zong jiao yan jiu* (Study of Christianity), Vol.19 (Beijing: Religion and Culture Press, 2015), 201.]

为圭臬。^① 各修会是天主教会的大动脉^②，在中国近代天主教史上，在不同时代各个地区扮演着主要角色的是修会。

但这些修会大多为成立于欧洲的国际修会。加上清末民初的法国保教权的作用，以至于到1919年，中国天主教没有一个中国籍教区，没有一位中国籍的主教。^③ “殖民特点”和“外国宗教”的印象让1901年抵达中国的比利时籍遣使会传教士雷鸣远（Vincent Lebbe, 1877-1940）逐渐形成了“中国归中国人”“培养本地神职”的想法。雷鸣远在各种场合提到过他的一个梦想：“如果我能亲吻第二位中国主教的权戒，我宁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是在他的“国籍教区运动”中，雷鸣远开罪于遣使会上司，被“流放”欧洲7年。1926年11月，六位中国籍神父在罗马被祝圣为中国籍主教，雷鸣远的梦想得以实现，1927年2月，在孙德楨主教的帮助下得以回到他魂牵梦绕的中国。

临行之前，雷鸣远致信接替他服务留学生的鲍朗，按照之前的计划，成立“国籍传教辅助会”（又称传教辅助团，S.A.M），任务是“甘愿作辅助地位的生活”“协助”本地籍的主教传教，不接受主教权位，也不接受教会任何高的地位。其主要精神是“完全适应当地风俗，尽可能的归化入籍，将过去传教并传自己国家的作风，完全打倒”^④。甫至河北，雷鸣远就热火朝天地展开工作，但是甚感人手缺乏、资金短少。蠡县教区土质多沙，地方贫穷，靠外地朋友的捐助不是长久之计。于是想出传教师资训练所的方案，这一计划促成了耀汉小兄弟会的诞生。

一般认为，成立修会的动议是在1927年冬天，在一次约有五位神父

^① 倪化东编：《天主教修会概况》，香港：香港真理学会，1950年，第35、36页。[NI Huadong, ed., *Monasticism and Religious Orders* (Hong Kong: Catholic Truth Society, 1950), 35-36.]

^② 倪化东编：《天主教修会概况》，第12页。[NI Huadong, ed., *Monasticism and Religious Orders*, 12.]

^③ 在此之前，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位中国籍主教，即康熙年间被祝圣的罗文藻（1616-1691）。

^④ 赵雅博：《雷鸣远与中国》，台中：卫道中学，1989年，第69页。[ZHAO Yabo, *Vicent Lebbe and China* (Taizhong: Viator Catholic High School), 1989, 69.]

参加的聚会上，由孙德楨主教决定下来，随后孙请雷鸣远具体办理。^① 消息传出后不久，即有六位志在苦修者报名入会，得到主教的允许后，雷鸣远开始着手创会。该会的第一次集会是在1928年正月。雷鸣远召集了报名的基本会士，齐聚河北蠡县张村，定下了传教救人的修会宗旨和苦修的生活原则，并且命名为“若翰小兄弟会”，以圣洗若翰^②为第一主保（中华真福为次主保），故命名为若翰小兄弟会^③。当年复活节瞻礼后，十几位望入会者按照约定，到安国开始动土修建会院，施工期间，席棚为屋，以砖为枕，饮食不过小米菜蔬而已。至1928年11月19日，终于建成茅舍数间，雷鸣远也正式迁居安国会院。^④ 1928年12月26日，若翰小兄弟会15位会士举行“穿会衣礼”，由孙德楨主教主持。各人皆丢弃自己的姓，称某某兄弟^⑤，并初步订立6条会规。1929年圣诞节，基本兄弟已完成了一年初学，行定志礼——全体在孙主教手里定志“永守神贫、全洁，并致死听命”。此时，有30多位兄弟。^⑥ 1930年圣诞节，行发愿礼。^⑦

1931年暮春，两位兄弟被派遣至比利时留学：在德兄弟，在复活节瞻礼后回国；翰佐兄弟，在1932年回国，到宣化总修院读神学。1932年秋后，小兄弟会初次全家8日大避静，随后派出二十余位出院工作，并在社会上得到“诚朴耐劳”的评价。1932年秋末，三天大避静，以全家大会形式举行，商议会务。^⑧ 1933年，第一批小兄弟共5人发终身大愿礼，至此，若翰小兄弟会共130多人。1934年会名改为“耀汉小兄弟会”。

^① 立珊兄弟：《若翰会五年的小史》，载《教育益闻录》1934年第6卷第3期，第342-343页。立珊兄弟本姓曹，入会后不再称姓，以兄弟自称和互称。[Brother Lishan, “Brief History in Recent 5 Yeas of Little Brothers of St. John the Baptist,” *Jiao yu yi wen lu* 6, no.3 (1934): 342-343.]

^② 即施洗约翰。

^③ 1933年改名为“耀汉小兄弟会”取“荣耀中华”之意。

^④ 立珊兄弟：《若翰会五年的小史》，第343页。

^⑤ 同上，第343页。

^⑥ 同上，第344页。

^⑦ 同上，第344页。

^⑧ 同上，第345页。

(以下简称“耀汉会”)

二、雷鸣远脱离遣使会加入耀汉会

耀汉小兄弟会在教会法意义上的创始人是孙德楨，但是精神上的创始人则是雷鸣远。雷鸣远受孙德楨主教委托管理会务，而他本人仍属于遣使会，假若遣使会的上司有所调遣，初生的耀汉会恐怕难以维持。耀汉会的会士多次要求他转入本会，但是他都断然拒绝，表示“圣召大事，不可等闲视之；如果没有天主显明的指示，切不可任意改变”^①。而耀汉会人数日益增加，也愈来愈离不开他。

与此同时，雷鸣远与遣使会之间的矛盾却日益尖锐。仅举一例：按照规定，雷鸣远去北平办事必须留宿在遣使会的会院所在地北堂，但是北堂不欢迎他，只好到宗座代表公署求宿，代表也不能留他，让他去北堂。宗座代表得知雷刚刚去过之后，只好让他带上写了字的名片再去北堂。其间的无奈可以想见。1933年中国的遣使会开会，推选代表参加总会长选举，会上决定雷鸣远如不重返欧洲，就认定他为遣使会的叛徒。^②

此前，对于耀汉会小兄弟们的劝告和建议，雷鸣远只是祷告，并讨教教会神长，始终坚持不自作决定。在愈益不利的形势之下，教廷代表、孙德楨、程有渔、任望远等人都劝他应当转会。他对宗座代表说“改入耀汉会并非我的意愿，而是你的命令，你就代表天主”^③。雷鸣远分别向罗马总部和遣使会总会提交了离会和入耀汉会的申请。孙和雷也写信给罗马，请求允许雷加入耀汉小兄弟会。宗座代表亦驰信罗马，表示支持。

^① 曹立珊：《春风十年》，台中：圣化月刊社，1950年，第156页。[CAO Lishan, *Chun feng shi nian* (Taizhong: Sheng hua yue kan she, 1950), 156.]

^② 赵雅博：《雷鸣远神父传》，台中：天主教耀汉小兄弟会，1963年初版，1977、1990年再版，第452页。[ZHAO Yabo, *Biography of Fr. Vicent Lebbe* (Taizhong: Little Brothers of St. John the Baptist, 1963, 1977, 1990), 452.]

^③ 曹立珊：《春风十年》，第156页。

1933年8月和11月，雷鸣远分别收到遣使会总长和教宗庇护十一世的批准回复，后者甚至准许他免作初学，直接发终身大愿并正式委任他担任本会第一任会长。^①

1933年圣诞节，雷鸣远和第一批兄弟四人举行“发终身大愿礼”，并为其他修生行“穿会衣”礼、“定志”礼，“发暂愿礼”，历时三个小时。其中“发终身大愿礼”中有一个“俨然殡葬礼”的环节，五位发终身愿者在司仪一声令下，扑倒在地，被一幅巨大的黑帐掩盖。这场面令在场者先是诧异震惊，继而唏嘘、啜泣，帐幔之下亦传出呜咽，最后五个泪人站起来，以恳切悲壮的音调说：“吁吾主！……赐我全死，以得生活……”^② 这一独特的礼仪形式表达的是耀汉会会士“打倒我”“打死我”“全死”的誓愿，意谓“全牺牲”。

那年耀汉小兄弟会已经有130多名成员，会务也从本地转向全国。^③ 至第二年，应山西汾阳教区刘主教同意，在中阳成立耀汉小兄弟会的分会。^④

三、会院文化

耀汉小兄弟会的一天开始得很早，夏季3点半起身，先作早操呼吸新鲜空气，晚上9点就寝，期间各安其工，会院静默无声。苦修、作工、静默、勤勉，都是耀汉小兄弟会独特的会院文化的一部分。以下分述之：

第一，平等谦逊。

^① 曹立珊：《春风十年》，第100—101页。《雷鸣远神父传》，第452页。立珊兄弟：《若翰会五年的小史》，第348页。

^② 曹立珊：《春风十年》，第126—127页。

^③ 小兄弟：《“夫至大”通牒与国产耀汉小兄弟会》，《铎声月刊》1944年第3卷第12期，第277页。[Little Brother, “Maximum illud and the Chinese Little Brothers of John Baptist,” *Duosheng Monthly* 3, no.12 (1944):277.]

^④ 心境：《若翰小弟兄会扩充汾阳教区之先声》，《我存杂志》1934年第2卷第1期，第120页。[Xinjing, “Little Brothers of John Baptist Enriched Fenyang Diocese,” *Wocun Magazine*, Vol.2, no.1(1934):120.]

作为一个国际修会，耀汉会首先去除了对外国神父的特殊待遇，其次造就了上下无差别的劳动与生活标准。1930年6月加入耀汉会的曹立珊第一次看到雷鸣远凭借瘦小的身体与其他十几位修士一起搬床板时，与新来的其他9位望会生都惊呆了在那里，胸中心潮澎湃。^①第一个周四晚饭，当雷鸣远为小兄弟们盛饭时，曹立珊简直是“心惊气短，食不甘味”^②。

论者若问，这是否只是做做样子？在笔者看来，这是“真诚的谦逊”。雷鸣远曾因为自己发脾气，亲自向会士下跪道歉。一天中午，雷鸣远径直走到正在读书的公仆神父面前，扑通一声跪了下来，以头抢地。后者也立刻跪下，伸手扶起雷。雷说：“兄弟，请原谅我刚才对你发脾气。”说罢，转身离去。原来是当日因有件事情雷鸣远批评公仆神父作的不够理想，而有所批评。后者并不认为是发怒，可是雷鸣远却不肯原谅自己。这样下跪道歉的场面不止发生过一次。^③他也要求小兄弟们如此去做，每次遇见修士发怒，总是命令他去找对方请求宽恕。^④

这与民国时期天主教会内贬抑华人的风气形成对比。据金良璧回忆，他最早入的正定修院，由外籍院长神父管理，“中国的修士多被派做粗重农植活儿，饭食也不同于外籍修士，更主要的是不被挑选学神职课程”，故而准备去耀汉小兄弟会修道。^⑤

第二，苦修：作工、劳苦、静默、克苦。

若有人在白天访问真福院，会发现院内非常安静，会士们沉默不

^① 曹立珊：《春风十年》，第6-7页。

^② 同上，第13页。

^③ 同上，第8-9页。

^④ 同上，第9页。

^⑤ 金良璧，1916年生，家族奉教，18岁时入北京司铎书院学习，1938年加入雷鸣远的“战地督导团”，1941年入安国真福院。后在开封传教，曾任开封市天主教爱国会副秘书长、教务委员会秘书长。金良璧：《回忆我的宗教生涯》，http://blog.sina.com.cn/s/blog_ed2b1c240101hf1i.html，2017年10月16日。[JIN Liangbi, “Hui yi wo de zong jiao sheng ya” (Recall My Religious Vocation), http://blog.sina.com.cn/s/blog_ed2b1c240101hf1i.html, Oct.16,2017.]

语，专心于自己的分内事务，得到团结、紧张和勤勉的印象。这是耀汉会刻意追求的苦修、缄默精神。雷鸣远说，“人生的本质就是工作，而工作的精神就是‘勤奋’”。他说“小兄弟工作当紧张化”“小兄弟从不休息”“变换工作就是休息”。^①

1928年正月耀汉会第一次开会，就定下了苦修的原则：终生度小斋，戒烟酒及一切嗜好。^②雷鸣远认为，传教与苦修可并行，概括为“在家苦修，在外传教”。^③不仅要作发愿的传教士，而且要作真正的苦修士。其苦修的内容，一方面是弃绝私意：“入会后当弃绝肉身一切小方便、小自在、小嗜好，并自己底私意，私断。”另一方面是“作工、劳苦、静默、克苦”^④，每人的职责全听长命，量力任职，职务则无限制（例如教读，跟神父，理厨，种园，施药等）。^⑤会规要求：不论是否具有神职，他们在初学时期，与无神品兄弟，完全一律，除在圣堂外，不享任何优待，而且在院时，亦需轮班工作。^⑥兄弟要“相亲相爱，与神职班，协力工作，如一家庭的兄弟然”^⑦。

1934年的会规简章规定：在院除散心时，不许说话，以苦为乐，视辱为荣，惟期达到成圣目的。^⑧雷鸣远规定温带的会院，不论寝室还是餐

^① 后两条在雷鸣远去世之前写入耀汉会的会规。曹立珊：《春风十年》，第76页。

^② 雷鸣远在订立了戒烟戒酒的会规后，即果断戒除了烟酒。

^③ 立珊兄弟：《若翰会五年的小史》，第341-350页。小兄弟：《“夫至大”通牒与国产耀汉小兄弟会》，第40-51页。

^④ 此二端都属于《穿会衣前当答之十问》，载于《教育益闻录》1934年第6卷第3期，第352页。[“Ten Questions before Wearing Monastery Suit,” *Jiao yu yi wen lu*, Vol. 6, no.3 (1934): 352.]

^⑤ 《安国教区若翰小兄弟会简章》，《教育益闻录》1934年第6卷第3期，第350-351页。[“General Regulations of Little Brothers of John Baptist in Anguo Diocese,” *Jiao yu yi wen lu*, Vol.6, no.3 (1934): 350-351.]

^⑥ 《神职界入会规章》，《教育益闻录》1934年第6卷第3期，第351页。[“Instructions for Clergy to Join Little Brothers,” *Jiao yu yi wen lu*, Vol.6, no. 3 (1934): 351.]

^⑦ 《安国教区若翰小兄弟会简章》，第350页。

^⑧ 同上，第350-351页。

厅，冬季都不能安置火炉，其目的是为了锻炼身体，增强意志。^①

第三，权威与慈爱并重。

任何一位入天主教修会的全职修道者，必须发贫穷、贞洁、听命三愿，在耀汉会，还需发第四愿，即全死愿。“神职界人人本会者，当保守二年（即初学），后发终身四大圣愿：绝对的神贫、听命、贞洁、全死。”并标明，全死愿即：“尽何职务，去何地方，全付于会长之慈权，自己毫无选择”。^②后因不合教会法典，将全死的意义与精神置于听命愿之中。^③会士与长上之间是绝对听命的关系。

耀汉小兄弟会是一个“家庭式的修院”，其家庭式结构和会院文化基调，在筹备期就已确定。在1928年12月16日，第一次穿会衣礼（有15人）后召开了临时院组织会议，定下的基本制度是：“（一）院制，以主教为院长，此院名为真福院。（二）主教不直接经理院务，派一神父驻院管理一切，名曰公仆神父。（三）由全院兄弟推选一位兄弟，襄助公仆神父，名曰公仆兄弟。（四）其余诸兄弟，在初学时期，除听道及作各神课外，勤作由长上派定之手工。（五）除规定的午饭晚餐后散心外，余时严守缄默。（六）本会本圣本笃之精神，欲造出一家庭式的修院，全权操在家长。其余修士、彼此以兄弟相称，院务皆由兄弟自行操作，绝不用服役。”^④1934年确定的会规与此相差不大。^⑤

按照会规，在耀汉小兄弟会的大家庭中，除公仆神父（即雷鸣远）、公仆兄弟外，并无长上。即使身为长上，在待遇、生活、劳作上也是平等的。但是，在权威上却非如此。

^① 曹立珊：《春风十年》，第128页。

^② 《神职界入会规章》，第351页。

^③ 曹立珊：《春风十年》，第145页。

^④ 立珊兄弟：《若翰会五年的小史》，第343-344页。

^⑤ “第四条 组织 只立一院，即真福院。现由教主（引者注：疑为主教之误）选派住院司铎，名为公仆司铎。由兄弟们公举一兄弟，襄理该铎人物，名为公仆兄弟，三年改选。若本区外堂有任用之事，可由长上选派兄弟前往服务，彼时悉听该本堂司铎之指挥。但每年当回来再度修士生活，住院至少二月。”《安国教区若翰小兄弟会简章》，第350-351页。

雷鸣远作为创会者和家长，他的权威是绝对的。雷鸣远特别强调新鲜空气的重要性，所以“禁止关窗睡眠，即使在严冬也不例外；更不准蒙头睡觉”。开窗睡觉的规定，曾遇到会士强烈的反对。雷鸣远固然有他的道理，但华北的冬季夜晚天寒地冻，若没有炉火，闭窗睡觉都难以忍受，何况开窗。每年冬天医务室都人满为患^①。即便如此，“意志坚强的雷神父，为维护他‘开窗睡觉’的主张，曾与部分反对者做‘殊死战’，直到他咽最后一口气时，始终没有同对方屈服。”^②

会士以血气方刚的青年为主，难免产生矛盾，亦难免有叛逆不顺从者。雷鸣远对属下的弱点，会原谅容忍，但是如果有伤爱德，则绝不宽容，竭力尽量在“日落之前”解决。^③雷鸣远在各种神修要求中，最看重爱人。

雷鸣远的权威，是慈爱与威严并重的家长式权威。“雷神父对待修士们，完全以‘诚’以‘爱’。他把他的思想和精神——更好说，他把基督的精神赤裸的交付给修士们，他有时待修士们很严，惩罚也很重，但人人看得出来——连被罚修士在内，他在责罚人时所表示的‘诚’与‘爱’。所以修士们渐渐称他为‘父亲’。”^④

故此，耀汉会的小兄弟们虽然多数时间保持沉默，却并不苦闷，反而拥有发自内心的欢欣。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每人各安其工，严守缄默。在午饭和晚饭后的散心时间，则轻松愉快。据一位王神父（Rev. Fr. King）记载：晚饭后，雷神父唱一句：“看兄弟们同居”，大家呼应“是何等乐哉！”“立刻全院都活跃起来，有的唱，有的笑，有吹箫的，有弹琴的，有的三五成群，散着步讲故事。”“他们不把雷神父看作‘高不可

^① 还有许多其他生活上的规定，例如：为更正华北乡村沐浴太少的弊病，雷鸣远规定“每日宜沐浴；至少每周一次”，并写入会规。见会规第113条。曹立珊：《春风十年》，第135页。

^② “是在他逝世后，安国教区王虑远主教才给本会开了‘闭窗睡觉’之禁”（引者注：疑应为开窗睡觉）。同上，第46页。

^③ “你们纵然动怒，但是不可犯罪；不可让太阳在你们含怒时西落，也不可给魔鬼留有余地。”（思高本圣经，《厄弗所书》4:26—27）；同上，第21页。

^④ 曹立珊：《春风十年》，第30页。

攀’的大上司，他们围起他来，问长问短，有青年小兄弟还扯雷神父的衣角，仿佛在同他开玩笑。”^①

耀汉小兄弟会的凝聚力，当然源自于雷鸣远的人格魅力和他对中国教会的全身心奉献，但更是因为他的“诚”与“爱”，对会士虽严厉却不失慈爱的态度，所以在七七事变以及抗战全面爆发之后，该会才能在雷的振臂一呼之下，团结一心、辗转南北，全力参与抗战救护。^②

四、修会精神：全、真、常的神修纲领^③

耀汉小兄弟会内平等谦逊、苦修之气氛与会院文化，实际来自雷鸣远的“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的神修纲领^④。自1933年起，雷鸣远生前每年的十天大退省时间，都会把这一纲领分在三天分析检讨。雷鸣远以此来训练他的门生，作为他创立的四个传教团体的基本精神。^⑤

这一九字诀纲领是雷鸣远经过深思熟虑，在长期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又都有圣经的依据，并加入他个人的理解。

第一，“全牺牲”。

^① 曹立珊：《春风十年》，第30页。

^② 同上，第46页。

可参侯杰、陈文君：《抗战时期的雷鸣远与耀汉小兄弟会》，李金强、刘义章主编：《烈火中的洗礼：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教会（1937-1945）》，香港：建道神学院，2011年，第115-130页。[HOU Jie and CHEN Wenjun, “Vincent Lebbe and Little Brothers of John Baptist in Anti-Japanes War,” in *Baptism by Fire: The Chinse Church during the Sino-Jpanese War(1937-1945)*, eds. LI Jinqiang and LIU Yizhang (Hong Kong: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2011), 115-130.]

^③ 此节参考曹立珊：《雷鸣远神父的神修纲领》，台中：天主教耀汉小兄弟会，1982初版，1990，1995年再版。[CAO Lishan, *Father Lebbe's Three Principles of Spiritual Life* (Taizhong, Little Brothers of St. John the Baptist, 1982 [1990/1995].)]

^④ 这一纲领或有其他名称“修身三格言”“处世九字诀”等。曹立珊：《雷鸣远神父的神修纲领》，第4页。

^⑤ 比利时辅助传教会（S.A.M），国籍耀汉小兄弟会（C.S.J.B），国籍德来修女会（C.S.T），雷鸣远国际服务团（I.C.A）。曹立珊：《雷鸣远神父的神修纲领》，第1、2、8页。

“全牺牲”出自圣经中“弃绝自己”（谷8:34）“脱去旧人”（弗4:22）“致死旧人”（哥3:4-10）“我们借着洗礼已归于基督的死亡，与祂同葬。”（罗6:4）“基督死于罪恶，仅仅一次：祂活，是活于天主。你们也要这样看自己是死于罪恶，在基督内活于天主的人。”（罗6:10-11）等经文，强调克制自我，摆脱“旧我”“老我”。^①

雷鸣远最早表述为“打击我”，或“离开自己”“克制旧我”“不关心自己”等。每年给新发愿修士举行迎送礼仪时，他总是警告新发愿者：以后不要让“故我”复萌。^②此后语气加强，提出“弃绝一切”“摆脱一切”以及“打倒我”的表述。安国真福院在初创期，曾经在自习室悬挂雷鸣远手书的标语，中间是“打倒我”，两边是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③雷鸣远称“旧我”为不倒翁，无法从根铲除，“打倒我”的真义，在于意志的坚决和行为的奋勉。“全牺牲”和“全死”出现在1933年圣诞节“矢志永愿”大典前后，成为大典前十天大退省中的默想题目^④。在“打倒我”标语两边，“死而后已”被改为“死而不已”。另一墙壁上贴出新的标语“打死我”。^⑤再后来，他常常用“牺牲”代替“弃绝”，说“全牺牲”是打倒我的最好解释。^⑥

前述发永愿礼中“如殡葬礼”般的“埋葬”环节，实际就是声明对旧我的完全弃绝。在耀汉和德来两会发永愿礼仪中，也各有一首该主题的歌曲，《赐我全死》和《你们已死了》。^⑦

^① 曹立珊：《雷鸣远神父的神修纲领》，第9、10页。

^② 同上，第9页。

^③ 同上，第8页。

^④ 1933年圣诞节前若翰小兄弟会大退省，雷鸣远主讲退省题目为：第一天：天主的生命——宠爱（神修基础），第二天：信德（神修机能），第三天：望德（神修机能），第四天：全牺牲（总论），第五天：绝财——神贫（全牺牲的对象），第六天：绝色——贞洁（全牺牲的对象），第七天：绝意——听命（全牺牲的对象），第八天：全死——天主之外无物（全牺牲的最高境界），第九天：爱德——真爱人，第十天：常喜乐。同上，第13-14页。

^⑤ 同上，第10页。

^⑥ 曹立珊：《春风十年》，第142页。

^⑦ 同上，第145页。

在全、真、常之中，雷鸣远似乎更强调“全牺牲”，他在讲神修纲领时，无论在量还是质上，都看出这样的倾向性。^①雷鸣远说的全牺牲，是“毫无保留的把自己现世整个生命奉献出来，为荣主救人，以得永生。”

牺牲的对象包括财、色、意三者。关于物欲，雷鸣远规定：东西越少越好，越不值钱越可爱，不准说“我的东西”要说“我们的东西”。雷鸣远出门时总是骑自行车，自安国至北京400里路，他一日即到，在外的行装也很简单：一经书、一日记、一袖珍四书、一支毛笔、一个硬木墨盒、一块毛巾、一把牙刷，雷说：连我自己在内，不超过100斤。关于色欲，除了情欲之外，雷鸣远把烟酒肉也列入所禁范围之内。小兄弟会平日粗茶淡饭，不可吃肉，即使在行军在外时亦坚持不可破戒。关于“意”，指虚荣欲，包括职务名誉地位等。天主教修会用“贫穷”“贞洁”“听命”三愿对抗这三者。雷鸣远为了抵制“虚荣欲”，又提出“全死”愿，以加强服从的力量。^②

雷鸣远因为老西开事件，也因为国籍主教运动，先是失去了上司的信任，丢掉副主教的职位，继而被“流放”到浙江，之后又被逐至欧洲，牺牲不可谓不多。但是，在“听命”与“服从”上，却甚少怨言，是为耀汉会小兄弟们的楷模与榜样。

第二，“真人”。

天主教强调爱德。《圣经》说“天主是爱”（若一4:8）“为人作的，就是为我作的”（玛25:40）“应爱你的仇敌，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玛5:44）都是根据。雷鸣远强调爱人的“真实性”。若望一书三章18节曰“我们爱，不可只用言语，也不可只用口舌，而要用行动和事实”，这句经文也常常张贴在真福院里。后来，雷鸣远在讲道时，把这句消极的否定句，改成了积极的肯定句“爱人要来真的！”不久即演变为“真人”了。^③

^① 曹立珊：《雷鸣远神父的神修纲领》，第25页。

^② 同上，第30页。

^③ 同上，第12-13页。

“真人”是先人后己。雷鸣远说：“真人就是时时事事，先人后己，使人获得真安慰和真益处。”不放过任何“牺牲自己，为人服务”的机会。“真人”是“无条件”的爱人。雷鸣远将“无条件”的原则列入会规“救人，要无条件的救人，不问人进教与否，以免让人怀疑我们所有的社会工作，都是求代价的”。1931年，河北高阳堤口等村水灾导致万余人缺乏口粮，难以过冬。村民派代表向耀汉会求救，并承诺获得帮助后将全体入教。雷鸣远接济了灾民，却没有接受入教请求。事后，三村请求雷鸣远派人办教理班，半年后有两千人入教。^①

“真人”的最高境界是爱“仇敌”。有一位叶神父曾经在Bulletin De Peking上写文章批评雷鸣远的建立国籍教区运动，此后在黑山扈偶遇雷鸣远本人，十分后悔，请求谅解。雷不仅原谅且与之结为长期书信往来的好友。^②“真人”是不怕吃亏，甘作“傻子”。“真人的核心，就是自己吃亏，让人占便宜”，雷鸣远也这样解释道。耀汉小兄弟会在当地曾有“傻小子会”的绰号，十分难听，但雷鸣远却特别喜爱这个称号，“我只嫌我愚蠢的尺度，距离耶稣还远，我只怕你们还没有进入‘愚蠢’之门”。“社会毕竟还需要一些‘蠢人’来为他支撑一点架子。如果人人都去迎合流俗，明哲保身，而根本不作应做的事，则人类社会可能早就不存在了。”^③

第三，“常喜乐”。

“常喜乐”出自《圣经》“你们在主内应当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应当喜乐！”（斐4:4）“应常欢乐”（得撒洛尼前书5:16）。^④这都是雷鸣远很喜爱的句子。雷鸣远早期常常使用“喜欢”“痛快”“愉快”等词，或“永远喜欢”“常喜欢”“常带笑容”“不悲观”“不带愁

^① 曹立珊：《雷鸣远神父的神修纲领》，第45、48、49页。

^② 曹立珊：《春风十年》，第3-5页。

^③ 同上，第52-53页。

^④ 此外还有：“几时人为了我而辱骂迫害你们，捏造一切坏话毁谤你们，你们是有福的。”“你们欢喜踊跃罢！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报是丰厚的，因为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曾这样迫害过他们。”（玛5：11-12）

容”“不说丧气话”等。直到1933年1月，有一位新人会者，雷给他起了“喜乐”的名字。此后，雷鸣远就把“常喜欢”改为了“常喜乐”。

“常喜乐”固然有“情绪愉快”的意思，但是在雷鸣远看来，更重要的是“意志上的乐观”，在逆境中“安泰宁静，百折不挠”，他常说“以喜乐精神迎接困难，困难已克服了一半”。喜乐还包括“超然的眼光”，“对人生所有不幸的遭遇——怀着极大的兴趣”。这超然来自于他所信仰的天主，他认为天主可以带来“真正而长久的平安与喜乐”，“从人间任何方面得到的所谓喜乐和幸福，都是空虚的，更不会‘常’。”他主张时常提升口的两角，以外表的笑容冲淡内心的苦闷。^①

在耀汉会的会徽上，画有两只蜜蜂。依照雷鸣远的解释，第一层含义是圣若翰在荒野以野蜜充饥；第二层含义是其象征含义：勤奋与服务，要求会士对内“勤劳、苦干、奋斗”，对外则须热诚服务。^②在雷鸣远看来，蜜蜂代表还代表着一个团体中“心情常愉快、面部带微笑的人”，可以“给人制造香甜的蜜汁，使人生活愉快舒畅，到处受人欢迎。”反之，“性情忧郁、愁眉苦脸、发牢骚、爱挑剔、怨天尤人、吹毛求疵的人，仿佛一只苍蝇，传播病菌、制造困扰、到处使人厌恶，必欲驱除它而后快”^③。

故此，雷鸣远说：最禁忌会士“面带愁容、说泄气话”。因为这种行为会“威胁本会的生存”。他要求“小兄弟无论心里痛快不痛快，身体有病没病，受委屈与否，总之无论天主赏他多少及什么样的十字架，必须常喜欢，且常带笑容。小兄弟应切记：常喜乐是大德行，它含有大真无伪的忍耐”，并表示：“真福院没有悲观人住的地方。”^④

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三者是有机联系的，雷鸣远解释为：“真爱人”为核心；“全牺牲”为条件，也是达成常喜乐必须有的行动和应

^① 曹立珊：《雷鸣远神父的神修纲领》，第57页。

^② 曹立珊：《春风十年》，第130页。

^③ 曹立珊：《雷鸣远神父的神修纲领》，第63页。

^④ 同上，第63页。

走的路线；“常喜乐”既是舍己为人的效果，也是奔向目标、破除困难的力量。^①

五、耀汉会的国际性与本土性

耀汉小兄弟会作为在中国跳动的一支蓬勃的动脉，兼具欧洲与中国双重血统。其欧洲血统乃因其初创时借鉴了不同修会的精神传统。例如方济各会的“彻底的神贫，极端的诚朴”，希图改变当时“尊卑悬殊、奋斗不和的社会”。^②

耀汉小兄弟会借鉴更多的是本笃会。雷鸣远在中国传教初期，曾有意请他在本笃会的胞弟伯达在中国建立一个初期本笃会院，可以度静默的内修生活，也可以度传教生活。^③ 雷初创修会时乃以本笃会为蓝本，初入耀汉会者，都获发本笃会会规一本。耀汉会的会院文化、灵修方式与纲领，若与本笃会会规相对照，有助于进一步加深理解，特别是对“牺牲”“谦逊”二者。

本笃会规有第七章谦逊十二级，将谦逊发挥至极致：前几级包括抑制欲望，不循私意，听命至死，坚持忍耐等，后面有“谦逊的第六级：一个隐修士对于任何东西，总以最简单和最粗劣者为满足，无论委派给他什么工作，他都将自己看作是一个无用的和不相称的工人，他与先知一同说道：我一无是处，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就好象畜牲一般，但尽管如此，我仍常与你同处。”“谦逊的第七级：一个隐修士不仅在口头上说，他比任何人都卑贱低下，而且在内心深处对此也深信不疑。他贬抑自己，并与先知一起说，至于我，成了微虫，失掉了人形，作人类的耻辱，受百姓的欺凌。我才被举起，便受辱而沮丧。又说：为叫我能学习你的法度，受苦遭难于我确有好处。”这与耀汉会的“苦修”一致。九至

^① 曹立珊：《雷鸣远神父的神修纲领》，第20页。

^② 立珊兄弟：《若翰会五年的小史》，第341-350页。

^③ 赵雅博：《雷鸣远神父传》，第425页。

十一级论缄默：“第九级：一个隐修士要谨慎言语，严守缄默，除非有人问及，决不开口说话。”耀汉会士在工作时保持静默，亦是以慎言表达谦逊。“第十二级：一个隐修士不但要内心谦逊，而且他的外在体态也要始终显露出他的谦逊，让所有的人能够看到。”^①本笃会会规虽无全死、牺牲字句，但是充斥着将自我一再放低，一再摈弃的精神，与“全死”“牺牲”的精神有一致之处。

耀汉小兄弟会以“若翰”命名修会，以“若翰”为第一主保，也是表明对谦逊的注重。^②在雷鸣远看来，若翰的基本精神就是谦逊。“因为克苦，勇敢，爱火及其它的德行，都植基在‘谦逊’上面，他们是谦逊开放的花朵，而不失根本。人没有谦逊，不会克苦；有了谦逊，才会不顾自己，只为天主，面对真理才显得坚强。”^③彼此互称“小”兄弟，也是表达“极端谦诚”之意。^④本笃会会规中对自我的贬抑，在笔者看来或有些极端。有些条文比如要求低头垂目，俯首视地，不轻易发笑等^⑤，未被雷采纳。

耀汉小兄弟会的中国血统，主要在于植根中国，对中国天主教本地化的使命与承担。

其一，“真福院”作为耀汉会会院的特定名称^⑥，显示对天主教中国化的独特信心。真福二字，除出自圣经“真福八端”外，还有以中华真福为次主保之含义。针对当时很多人质疑“中国人能成圣吗？”雷鸣远高呼“中国人能成圣，中国已有圣人”。^⑦雷鸣远大量印刷中华真福的画

^① 米歇尔·普契卡：《本笃会规评注》，杜海龙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第148-196页。[Michaela Puzicha, *Kommentar Zur Benediktusregel*, trans. DU Hailong (Shanghai: Shanghai SDX Publishing Company, 2015), 148-196.]

^② “其所以定名为若翰小兄弟者，表的是谦逊的意思。”《安国教区若翰小兄弟会简章》，第350-351页。

^③ 曹立珊：《雷鸣远神父的神修纲领》，第86、87页。

^④ 赵雅博编著：《雷鸣远神父传》，第428页。立珊兄弟：《若翰会五年的小史》，第341-350页。

^⑤ 本笃会规第7章12节，《本笃会规评注》，第149页。

^⑥ 包括安国真福院、北平清河真福院、山西布施真福院等。

^⑦ 曹立珊：《春风十年》，第59页。根据天主教传统的“圣”的概念，圣人应该是“师法基督的典范”“战胜了恶魔的邪恶力量，从而充盈着基督神圣力量的人”以

像，廉价卖给信徒，以示宣传，并张贴在圣堂的墙壁。他们的历史也屡次成为用餐时朗读的内容。^① 雷鸣远以此勉励中国天主教徒可以成为师法基督的典范。耀汉会小兄弟们以“诚朴耐劳”取得的成绩没有让雷鸣远的期待落空。

其二，如前所述，耀汉会的独特使命是建立一个非神职的中国修会，不培养司铎，只为辅助国籍司铎而工作。雷鸣远本着“好事都许我们作”的原则，让会士们承担厨师、园丁、农夫、纺织、印刷等各种工作，并要求每位会士都需掌握一项技能。各方人士受到吸引前来参观访问，申请入会者甚至包括土匪、和尚、老道、军人、已结婚夫妇（双方同意入会）等。1930年，耀汉会人数突破60，1937年增加了约100。1934年开办清河分院（也称清河教养院、清河真福院）。1934年小兄弟们受到各地国籍司铎的邀请，被派往山西汾阳、洪洞，河南开封等地辅助传教。^② 工作范围除了早期的传教、印刷、教育外，增加了诊所、面粉厂、纺织厂、免费施粥、理发等。^③ 清河真福院的水稻、葡萄园、棉田均造福地方，也为耀汉会的事业提供一定的保障。^④ 后来由于若干修士和司铎的加入，耀汉会改变了方针，允许培养司铎。但神职与非神职一律平等的原则决不改变。

其三，耀汉会是天主教礼仪和音乐本地化的先锋与实践者。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1962-1965）正式许可天主教礼仪使用本地语言之前，虽有利类思、龙华民获准将弥撒经本、日课经本和常用的祈祷文翻译为文言文，但未获准用中文举行弥撒。在1920和1930年代雷鸣远为耀

及“为基督殉道者”，当然“圣人必须经教会权威公布和认可。”赵建敏：《天主教成圣观的天人合一幅度》，何除、林庆华主编：《基督教与道教伦理思想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8-164页。[ZHAO Jianmin, “Tian zhu jiao cheng sheng guan de tian ren he yi fu du,” in *Ji du jiao yu dao jiao lun li si xiang yan jiu*, eds. HE Chu and LIN Qinghua (Chengdu: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2006), 148-164.]

^① 曹立珊：《春风十年》，第59、60页。

^② 小兄弟：《“夫至大”通牒与国产耀汉小兄弟会》，第282页。

^③ 赵雅博编著：《雷鸣远神父传》，第438页。

^④ 小兄弟：《“夫至大”通牒与国产耀汉小兄弟会》，第283页。

汉小兄弟会亲自编订中文歌本，将圣咏、答唱咏、日课等，或者用额我略曲调配上中文歌词，或者重新谱曲，甚至谱以中国风格的旋律。^① 会士们以中文咏唱日课，弥撒中也大量使用中文圣咏。雷鸣远的计划是“完成全部中文罗马日课，无论司铎修士，在家完全使用中文罗马日课为正式日课，弥撒以及其他礼节也完全要以中文为本，在尽可能范围内都加上中国音乐，完全成为中国式。”^② 这一计划现已部分实现，但是在雷鸣远的年代，则是超前于时代并富于勇气的本地化举措。

第四，耀汉小兄弟会对抗日事业的担当，更凸显了其中国身份。1933年春，日军窥伺热河，进犯长城，雷鸣远亲自带领耀汉小兄弟会组织救护队，在枪林弹雨中救护伤兵。战事间隙，又带领救护队参加熊希龄的红十字会参与修路。随后，耀汉会为伤兵成立了“残废军人疗养院”，收伤兵一百七十八人。这次抗战经历，促使雷鸣远将“若翰会”改为了“耀汉会”，取“荣耀中华”之意。1936年绥远战起后，雷鸣远屡屡请缨，请求带领救护队奔赴战场，傅作义建议他在后方医院工作，雷鸣远当即拒绝：“人之所以怕这怕那者，是为了生命问题，没有生命便什么都不怕了。我们小兄弟会的绰号，却叫做已死队。”^③

综上，在天主教本地化运动中诞生的中国本土耀汉小兄弟会，在其形成早期（1928—1934年），即形成了平等谦逊、苦修、权威与慈爱并重的会院文化，其精神核心是创会者雷鸣远提出的“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简称“全”“真”“常”三字）神修纲领。这种会院精神既源自

^① 洪力行：《雷鸣远神父的圣乐遗产：保存、研究与运用》，载《2015雷鸣远神父跨国研究计划暨系列国际研讨会》会议册，第36-38页。[HONG Lixing, “The Music Legacy of Fr. Vincent Lebbe: Its Reserv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se,” in *Conference Proceeding of International Composium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 Plan of Fr. Vincent Lebbe* (Leuven: 2015), 36-38.]另参见 Ka Chai Ng, “The Indigenization of Gregorian Chant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he case of Vincent Lebbe and His Religious Congregations” (M.Phil. thesi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7).]

^② 赵雅博：《雷鸣远神父传》，第427页。

^③ 同上，第460—466页。

圣经，也是对方济各会、本笃会精神的继承，此为耀汉会小兄弟会的欧洲血统，而创会于中国，服务于国籍司铎，对中国天主教本地化的使命与承担则决定了他的本土身份。从会院名称、创会使命、传教实践、礼仪改革和抗战参与等各方面看，耀汉小兄弟会将天主教隐修传统和中国传教使命紧密结合，为天主教本土化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步伐。

表述为“全死”“已死”的“全牺牲”始终都是雷鸣远神修纲领中最着重强调的部分。方豪曾经评价：“雷神父一生，千言万语，只是一个‘公’字。因为他公而忘私，所以能‘全牺牲’；因为他公而不私，所以能‘真爱人’；因为他公而无私，所以能‘常喜乐’。他的三字诀‘打倒我’，亦即是彻底的忘私、不私、无私。”^①若相比中国人在宗教信仰上的某种功利倾向，雷鸣远的“全牺牲”实富有极强的历史与现实意义。若结合雷鸣远此前在“国籍司铎运动”中的付出，和愿以生命为代价“亲吻中国主教权戒”之奉献，可知雷鸣远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唯因其“无私”，雷鸣远和他带领的宗教团体才能融入中国社会，深入人心。唯因其“无私”，誓与国家民族生死与共，耀汉小兄弟会的中国身份才更加确定无疑，成为本土修会的典范。

^①曹立珊：《雷鸣远神父的神修纲领》，第18页。

参考文献 [Bibliography]

西文文献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Ng, Ka Chai. "The Indigenization of Gregorian Chant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he case of Vincent Lebbe and His Religious Congregations." M.Phil. thesi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7.

中文文献 [Works in Chinese]

曹立珊：《春风十年》，台中：圣化月刊社，1950年，第156页。[CAO Lishan. *Chun feng shi nian* (Ten Years of Cultivation). Taizhong: Sheng hua yue kan she, 1950.]

曹立珊：《雷鸣远神父的神修纲领》，台中：天主教耀汉小兄弟会，1982初版，1990，1995年再版。[CAO Lishan. *Father Lebbe's Three Principles of Spiritual Life*. Taizhong: Little Brothers of St. John the Baptist, 1982, 1990, 1995.]

顾安基：《天主教修会重整史》，孙纯彦译，台南：天主教闻道出版社，2007年。[Cuesta, Fr. Angel M., O. A. R. *History of Rearranging Catholic Congregations*. Translated by Fr. Benito Suen, O. A. R. Tainan: Catholic Window Press, 2007.]

洪力行：《雷鸣远神父的圣乐遗产：保存、研究与运用》，载《2015雷鸣远神父跨国研究计划暨系列国际研讨会》会议册，第36-38页。[HONG Lixing. "The Music Legacy of Fr. Vincent Lebbe: Its Reserv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se." In *Conference Proceeding of International Composium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 Plan of Fr. Vincent Lebbe*, 36-38. Leuven, 2015.]

侯杰、陈文君：《抗战时期的雷鸣远与耀汉小兄弟会》，李金强、刘义章主编：《烈火中的洗礼：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教会（1937-1945）》，香港：建道神学院，2011年，第115-130页。[HOU Jie & CHEN Wenjun. "Vincent Lebbe and Little Brothers of John Baptist in Anti-Japanes War." In *Baptism by Fire: The Chinsse Church during the Sino-Jpanese War (1937-1945)*. Edited by LI Jinqiang and LIU Yizhang, 115-130. Hong Kong: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2011.]

《安国教区若翰小兄弟会简章》，《教育益闻录》1934年第6卷第3期，第350-351页。["General Regulations of Little Brothers of John Baptist in Anguo Diocese." *Jiao yu yi wen lu*, Vol 6, no.3 (1934): 350-351.]

《神职界入会规章》，《教育益闻录》1934年第6卷第3期，第351页。["Instructions for Clergy to Join Little Brothers." *Jiao yu yi wen lu*, Vol 6, no. 3 (1934): 351.]

- 雷鸣远：《雷鸣远神父书信集》，耀汉小兄弟会编译，台中：天主教耀汉小兄弟会，1991年。[Lebbe, Vincent. *Correspondence of Fr. Vincent Lebbe*.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Little Brothers of John Baptist. Taizhong: Little Brothers of John Baptist, 1990.]
- 李启煌：《耀汉会在华宣教研究1935-1941》，台湾东华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LI Qihuang. “The Evangelizing of Little Brothers of St. John the Baptist in China, 1935-1941.” MA thesis, Dung Hwa University, 2015.]
- 立珊兄弟：《若翰会五年的小史》，载《教育益闻录》1934年第6卷第3期。[Brother Lishan. “Brief History in Recent Five Yeas of Little Brothers of St. John the Baptist.” *Jiaoyu yi wen lu*, Vol 6, no.3 (1934): 342-343.]
- 小兄弟：《“夫至大”通牒与国产耀汉小兄弟会》，《铎声月刊》1944年第3卷第12期，第277页。[Little Brother. “Maximum illud and the Chinese Little Brothers of John Baptist.” *Duosheng Monthly* 3, no.12 (1944):277.]
- 刘国鹏：《天主教修会之组织及源流》，《基督宗教研究》（第十九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LIU Guopeng. “Organization and Origins of Catholic Religious Orders.” In *Jidu zong jiao yan jiu* (Study of Christianity), Vol.19. Beijing: Religion and Culture Press, 2015.]
- 倪化东编：《天主教修会概况》，香港：香港真理学会，1950年。[NI Huadong, ed. *Monasticism and Religious Orders*. Hong Kong: Catholic Truth Society, 1950.]
- 米歇尔·普契卡：《本笃会规评注》，杜海龙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Puzicha, Michaela. *Kommentar Zur Benediktusregel*. Translated by DU Hailong.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5.]
- 《穿会衣前当答之十问》，《教育益闻录》1934年第6卷第3期，第352页。[“Ten Questions before Wearing Monastery Suit.” *Jiao yu yi wen lu*, Vol 6, no.3 (1934): 352.]
- 心境：《若翰小弟兄会扩充汾阳教区之先声》，《我存杂志》1934年第2卷 第1期，第120页。[Xin Jing. “Little Brothers of John Baptist Enriched Fenyang Diocese.” *Wocun Magazine*, Vol 2, no.1(1934):120.]
- 赵建敏：《天主教成圣观的天人合一幅度》，载何除、林庆华主编：《基督教与道教伦理思想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8-164页。[ZHAO Jianmin. “Tian zhu jiao cheng sheng guan de tian ren he yi fu du.” In *Ji du jiao yu dao jiao lun li si xiang yan jiu*. Edited by HE Chu and LIN Qinghua, 148-164. Chengdu: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2006.]
- 赵雅博：《雷鸣远神父传》，台中：天主教耀汉小兄弟会，1963年初版，1977、

1990年再版。[ZHAO Yabo. *Biography of Fr. Vicent Lebbe*. Taizhong: Little Brothers of St. John the Baptist, 1963 (1977/ 1900).]

赵雅博：《雷鸣远与中国》，台中：卫道中学，1989年。[ZAO Yabo. *Vicent Lebbe and China*. Taizhong: Viator Catholic High School, 1989.]